



哥伦布大交换

——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美】艾尔弗雷德 W. 克罗斯比 著
郑明萱 译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30周年版



哥伦布大交换

——1492年以后的生物圈和人类历史

THE GREAT AMERICAN DISCOVERY
1492

THE GREAT AMERICAN DISCOVERY
B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of 1492

中信出版社

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

30周年版

哥伦布大交换

——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美】艾尔弗雷德 W. 克罗斯比 著

郑明萱 译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658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哥伦布大交换：1492 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30 周年版/
(美) 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4
(国际环境译丛)

ISBN 978-7-5111-0176-1

I. 哥… II. ①克…②郑… III. ①生物地理学—研究②社会发展—影响—自然环境—研究 IV. Q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017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by Alfred W. Crosby, J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aeger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ABC-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3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BC-CLIO, LLC.

简体中文版由 ABC-CLIO, LLC 授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仅限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丛书总策划 刘友宾
第一辑策划 马琦杰 周煜
责任编辑 周煜 唐大为
责任校对 刘凤霞
封面设计 龙文视觉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电子信箱: cespchris@gmail.com
联系电话: 010-67112738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翻印、转载，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出版前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环保事业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我国在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和保护、环保基础能力提升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很多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

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必须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携手保护地球家园，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

环境图书出版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传播环保理念与知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环境科学出版社，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从 2009 年开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明确提出将国外环境图书作为一条新的、重要的产品线，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的环境理念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呈献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中的一种。“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包括《瘟疫与人》、《土地的变迁》、《乡村里的推土机》、《消逝中的荒野》、《哥伦布大交换》和《荒野与美国精神》等 6 种图书。这一辑译丛着眼于各国环境保护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新成果，特别注重引介一些前沿性、边缘性和综合性环境学科的新成就。因时间仓促，本辑图书可能还有不少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不断改进，努力把“国际环境译丛”打造成一条具有广泛影响的产品线。

今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将继续深化产品创新，努力引进出版更多的国外优秀环保图书，扩大国外环境图书的市场覆盖面，为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30 周年版前言

以生态观点重新解读历史

——美国著名史学家 麦克尼尔 (J. R. McNeill)

美洲博物学家、评论家，以及现代环境主义之父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在他 1949 年出版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中呼吁，应该以生态观点重新书写历史。一整代史学家都未理会他的呼声。然后在 1960 年代的社会骚动与混乱之中，本书作者罗斯比来了，他走的是自己的一条路，也得出了与利奥波德相同的结论。接下来他更进一步，真的动笔写了这样一本著作，严肃看待生态在人类事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你现在手上拿的这本书。

利奥波德一定会很感欣慰，罗斯比的那些同行则不见得。《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 1972 年才终有绿林出版社 (Greenwood) 接手。学术刊物上的书评，从严厉苛刻到客气礼貌均有，许多甚至不屑一顾懒得评论。罗斯比任教大学的同事则抱持怀疑态度，不能确定这样写法真能算是历史。这本书却不肯就此消失，它的文字清晰简洁，它的主题似乎越来越显得重要，不断在全美许多大学书单上出现，而且还译成了西班牙文与意大利文。

我自己与这本书初相逢，是 1982 年的一个雨天。在我暂用的某间研究室里，随手从齐肩高的架上取下它来，然后一口气读完，连晚餐也全忘了。任何许久之之前所读的书，我很少能精确忆起当时的情境因由，只有《哥伦布大交换》是例外，连那时心中激起的兴奋刺激，都一起深深印在脑海里。从那一刻开始，历史对我而言，就再也不一样了。或许，当时的我特

别容易接纳此书，因为已在英联邦的宪法史堆内，埋头苦干了好多好几个月了。

许多人都在克罗斯比这本书中发现了新视野，用以观看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它也成为建立环境史领域根基的文本之一，这门新学科于 1970 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主流史学家也渐渐注意此书，及至 1990 年代，“哥伦布大交换”的观念，已开始进入好几本美洲与世界史教科书内。

“哥伦布大交换”一词本身，也如同它的同名书表现极佳。历史学家并不是常常能有这种机会，可以新铸出一个简单新词，成为涵盖某些复杂现象的标准用语。可是今日美国几乎所有专业史学家，以及海内外许多学者，都听过“哥伦布大交换”一词。许多人甚至能作出相当正确的概述，解释克罗斯比此词用意——即使未曾读过此书。克罗斯比提出的这些概念，30 年前饱受史学界漠视、出版界忽略，甚至某些评论界敌意对待，如今却成为近代史标准论述的重要一环。

克罗斯比的理论，当然也是建立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的。他并未亲入档案库藏搜索，未在故纸堆中挖出有关麻疹、绵羊、牧草的文献。地理学家对农作物的传播分布有兴趣；人类学者及少数历史学者，则想弄清楚 1492 年后发生在美洲的多起疫疾与人口大灾难的现象。读者可以在克罗斯比书中脚注寻见这类著作。可是在克罗斯比之前，却没有任何人把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也没有任何人把这些主题写得如此风趣生动。¹

因此对史学界来说，克罗斯比构架出了一个新的主题。他在 1986 年的著作《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中继续追探生态议题，焦点转向世界其余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地；并主张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之所以能够独霸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就是因为背后有这种有系统而不对称的生物交换冲击相助。其他学者也进一步丰富他的理论，指出哥伦布大交换中的某些西非元素，比如 1690 年后巩固了卡罗莱纳低地大栽植场型经济的稻米，即可能来自非洲。²

克罗斯比在本书中对非洲着墨不多，并非没有理由。回到 1960 年代，有关非洲的史观史论正在成形，因此他需要的那类信息，当时并不似后来那么容易取得。他虽然探讨了美洲作物对现代非洲的重要性；可是在旧世界对美洲提供的生命贡献上，非洲的作物、疾病、人民，其实也同样举足

轻重——在某些地区甚至占有支配地位。别忘了，1880 年之前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的人，绝大多数是非洲人。1820 年之前每 5 名横渡大西洋的移居者，就有 4 名来自非洲。虽然他们是系着锁链而来，他们家乡的某些动植物也跟着他们来了：包括非洲的稻米、秋葵、山药、黑眼豇豆、小米、高粱、芝麻，以及那些引发黄热病与疟疾的病原。咖啡也来自非洲，虽然不是搭奴隶船而来。此外，非洲人也带着他们极有效的稻作技术，以及他们不怎么有效的黄热病与疟疾疗法来到美洲。

克罗斯比提出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价值不在其完整全面，却在他建立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模式，用以了解生态与社会事件。的确，只要稍用一点想象力，就可以发现克罗斯比揭示的那类交换几乎无处不在，却遮蔽在时间迷雾之中，永远无法像克罗斯比为哥伦布大交换提供的细节那般，详细为人了解。早在哥伦布之前，印度洋上的水手就知道顺着季风航行，在东非与印度之间往来。他们载着作物、虫害、杂草、疾病，来回反复两地，也带着高粱、珍珠粟、龙爪稷来到印度。顺着季风而去的其他类似交换，也在东南亚群岛与中国之间发生。某种早熟型的稻品种：占城稻（占城即今日越南——译注），令中国粮产自 13 世纪起变得丰足甚多，也为宋明两朝的国力与繁荣作了保证。亦如克罗斯比在《生态扩张主义》书中指出，另一场时间上离现在较近，但是规模同样浩大，却相当单方面的生物交换，也在另一处新旧世界之间发生：一边是太平洋上诸岛与澳大利亚，另一边是欧亚大陆。也就是 18 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太平洋上的多次航行，以往各自存在的生态系统从此结合，结果惊人地戏剧化——可与哥伦布大交换齐驱。虽然这些两极相逢事例，并没有马铃薯或玉米等级的礼物送给世界（其中最成功的生物出口，大概要数桉树属植物），可是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大溪地等地的居民与生态系统来说，这个或可称之为“库克大交换”的事件，绝对震撼冲击到了极点。

与哥伦布大交换平行发生的事例，也在陆上出现。公元前 100 年，商旅车队首度确立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商业交换。种子、胚芽，搭着颠簸之旅而去。樱桃，或许连同天花、麻疹，来到了罗马世界；中国则换得了葡萄、苜蓿、驴子、骆驼，或许其中也包括了天花、麻疹。

当骆铃叮当，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来往于马格里伯（Maghreb）（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译注）与西非之间，类似的事情也必然同样发生。公元 500 年之前，也有过一位非洲的哥伦布，他的名字我们永远无

法知晓，但他为定期的交通来往正式揭幕。于是马儿来到西非，造成的革命性政治效果，与马儿在北美印第安大平原上带来的冲击应该合拍。虽然在西非养马的难度令情况稍有不同。尽管如此，马的军事用途，尤其是用来对付那些无马之族，也帮忙重组了西非的政治版图，遂有加纳、马里、桑海等大帝国于焉兴起。

跨撒哈拉沙漠行走的商队，也在西非与地中海世界之间交换病原。1490年代梅毒暴发，或许系自美洲输入，但也代表西非雅司病某种突变。反向而去，欧亚大陆某些人类群体型与动物群体型疾病，或也藏在骆驼客身体组织内进入西非。老鼠、跳蚤，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穿越了撒哈拉，于14世纪疫疾大流行时期，将淋巴腺肿鼠疫带到了沙漠南方半干旱区域萨赫耳。

种种生物大交换事件，如果确如上述所形容般曾经发生，它们对欧亚大陆与非洲历史的塑造影响，必如哥伦布大交换一样确定。虽然冲击规模或许较小，而且至少在目前如此，记录的资料文献也不及克罗斯比汇聚凸显的完备。但是或许有一天，它们也终将找到它们的克罗斯比，为它们写下专著，不但令利奥波德在天之灵欣慰，也会在一个潮湿午后，改变某个人的历史视界。

30 周年版作者序

自大陆冰河融化以来人类的全本演义

作品一旦问世，我从来都不再看自己写的书，因为出版就如零下冻结，所有不精确、不正确、不到位处，都立时变为固定，成了永远挥之不去、难以触碰的痛。但是这一回，为了写这篇新序，我把《哥伦布大交换》从架上拿下来，还真的重新看了一遍。缺失？毛病？噢，是的，我会跟大家详细、坦白地讨论几项。可是，它仍然是本好书，这方面我也会谈上一些。

首先，是道歉。30 年前，我用“man”（男人）这个字意指现代智人所有成员。当时大多数人也都如此用法；但这事那时候蠢，现在也同样笨。而且，我竟然还用“种族”（race）这个字眼，好像自己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又说，玛雅人是所有原住民族中，最“敏感”的一族；却完全没意识到这种口气有多么高高在上、教人领情的味道。难道，我是在暗示大征服者科尔特斯，当时可能曾邀玛雅人来喝上几杯鸡尾酒，但铁定没请过阿兹特克族吗？（此版本没有相关段落——译注）

如此这般，还有许多。我请各位读者自己斟酌，从我的书页之中，挑选出昨日压扁的塑胶黄花。

当然，我也犯了一些明明白白的错误，有些还真的错得挺不错呢。比如先前从未感染过天花的人口，一旦流行暴发，“并非”一律都会导致高达 30% 的死亡率；只有最严重的疫疾如此。而安的列斯群岛的居民，并未在 16 世纪中期全数灭绝，只有“大”安的列斯群岛如此。而加勒比族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生存了下来。小麦的老祖宗，也不似玉米的老祖宗那般，产效远逊于人为培育改良的徒子徒孙。野生小麦虽然难以收割，但同样丰饶多产。西南亚民族之所以能够领先其余人类，率先在农事、城市化上有

所表现，或许这正是其中的一项原因。

我最大的错误，则是当时大家普遍都很无知的一项；我还真喜欢这个错呢。我在第六章宣称，而且是出于权威姿态：5 亿年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极端、永远、影响及于全球的重大自然改变事件。但自《哥伦布大交换》出版之后，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已经积累证据显示，大约在 6 500 万年前，曾有过一颗小行星之类的东西撞击地球，一举灭绝了恐龙，为哺乳类开路清场，同时也使我成了个大笑柄。

表现最欠佳、最无法抵挡过去 30 年风雨的一章（虽然也未被完全替代作废），则是第四章关于梅毒的重新评估。当年我写这章的时候，有关此病的发源地还是个大谜，其实今天也仍然未解——不管报上怎么宣称，而且至少每 5 年就表示有最新发现。1492 年之前，梅毒即已在新世界存在吗？在那里，变形、留疤的骨骸还真不少，似乎显示它老兄确曾光顾。可是这个“它”，是指性病型梅毒吗，还是非性病梅毒中的一种？或者无论哪种类型，它们根本都只是同一个家伙的不同表现？

“它”，1492 年之前也已在旧世界出现了吗？旧世界里，也有一些哥伦布年代之前的骸骨，类似那些被冠上梅毒病状的新世界伙伴，可是为数极少。当然，数字虽小，并不能证明它们的倒霉原主就“没有”梅毒；可是如果他们真有梅毒，这病的性质也一定异于 16 世纪欧洲暴发的性病疱疹，起码感染力较低。否则，若不是这个情况，那么 1492 年之前的旧世界众人，就一定百分之百地守身如玉，或完全地单一结合。如此人事，真属难能可贵值得赞佩，也因此不太可能。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以实际证据显示确有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在其组织内存在的最老一具古尸，是那不勒斯贵族女子亚拉冈的玛莉亚（*Maria d'Aragona*）。她死于 1568 年，离哥伦布出航年代已经很久，因此她的组织所能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也不过就是在她生时，欧洲正流行此病；而此事我们本来就已经确知，可惜梅毒螺旋体留下的痕迹，随时间会慢慢褪去，所以即使有哥伦布之前的任何遗骨可用，上面的印记恐怕也淡微至极，很难借目前的科技手段进行调查。

我们不知道性病型梅毒到底始于何处。它可能来自此处、彼处，也可能既来自此处、也来自于彼处；而且原本温和的诸螺旋体株，在 1492 年碰了面，跨越了大西洋，致命性于是出现三级跳。又或许，此疫毒性在 1500 年左右的突然剧增，与哥伦布完全扯不上关系，根本就只是巧合而已。这

种说法也不无可能。

反正，我当初不该这么尊崇梅毒，竟唯独给它一整章的地位，简直就当成了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玛的复仇记。诚然，梅毒在旧世界首次登场亮相，气势实在壮观；而且，一如所有性爱之事，也令人神魂震慑。但总不至于像 14 世纪那场黑死病，或 16 世纪天花疫情，一举改变了时势、创造了历史吧！我之所以把它奉为要角，是因为看到这么多疾病跨海西去，却不见任何东来回敬，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我就像过去好几代地理学家一般，他们在库克船长证明其实不然之前，一直坚信在极远、极远的南方，必定对称着某块大陆，一个称作澳大利斯的未知之地，巨大到可以平衡欧亚、非、美三大陆所有加起来的面积。第四章，便是本人针对流行疫疾，所做的某种地理对称式平衡尝试。结果，那些地理学家错了，我也错了。新旧世界之间的疾病交换，几乎根本不成对称。而过去 500 年间，也鲜有其他任何因素，对历史有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力。

所以，对于这个法国佬的痘病，我当初应该只是略微致意。反之，却该以一整章的篇幅，而非仅区区数页而已，研究后哥伦布时代的大规模奴隶种植场；尤其是东南亚蔗糖与美洲烟草农园现象。欧洲人嗜甜之习（或许“糖瘾”一词更为恰当），竟成动机诱因，促使数百万非洲人被强运过大西洋为奴。而烟草杀人之数，比梅毒更众，才真是蒙特祖玛的大复仇呢。

到此，自贬自谦得差不多了，用意再高尚也可以停了。让我们转而看看这本书值得一阅之处。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所谈的对象，巨大到我们经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正如我们往往未意识到自己时刻呼吸的空气一般。本书内容，即是自大陆冰河融化以来，我们这个物种的全本演义。这整个故事是在述说：各个生态系统与其相关社会，在升高的海平面阻隔之下，各自发展的分异演化；以及当它们乍然相逢，对彼此造成的激烈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如此浩大，甚至无法用我们惯常的知识分类：考古学、历史学、植物学、医药学、人口学，等等，单独圈限涵盖。

30 年前，我实在太过天真，以为自己可以在所有这些领域之中涵泳效力。但是初生之犊的烂漫，如果坚持不懈，却可以引导你穿过株株单树，走到某些极具意趣的树林。它便是这般带领了我。

若没有 1960 年代的动荡混乱，我怀疑自己会出发进行这场远足（这场所谓“60”年代的混乱，其实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的水门事件为止，公然反抗十进制年代系统的限制）。当时的我，已在刻板僵直的 1950

年代修得美国史博士学位。给予我学术训练的（毫无例外都是男的）人，多数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对于自己曾经奋战保护的社会基本良善，他们鲜少有过怀疑。对这些人来说，美国史就是政治史，其他都是其次；美国史的定义与意义，就是4年一届总统的选举，偶尔或间以战争火炬点缀，而且好人一定打赢。至于好人是谁，那可都是由长得颇像本人的人士组成。历史呢，就是关于我这类人的故事（当然是美国人，或者福气差一些，至少也是个欧洲人）。总而言之，在过去，历史是一页页进步之史的记录，未来也将依然如是。

然后，就在我自己也步上讲台之际，民权与“黑权”的奋斗开始了。这些运动教导了我，使我明白原来那些长得不像我的人，过去一直被长得像我的人恐怖虐待。然后是越战，又教导我看见世界并不只是北美与欧洲而已，长得像我的人也不见得总是打胜仗；有很大一些历史、很多一些层面，竟然都遗失在我自己正在教导的历史之外。

因此60年代“全球化”了我的心智，这可是早在“全球化”一词进入新闻术语的25年之前。比方说，如果越共竟能成功对抗了美国武装部队，尽管后者船坚炮利有着一切科技上的优势；又如果非洲人先前多少击退了欧洲帝国主义的进逼，坚持好几个世纪之后方才屈服；那么为什么，美洲印第安人，整体而言，却这么轻易就被征服了呢？难道科尔特斯只是重重吹了几口气，就把蒙特祖玛的屋子吹倒了？或还是其实另有他因在发生作用？

60年代掀起的风潮，令某些人走上意识形态的论述，却把我驱向了生物学。我一向就对生物方面感兴趣，虽然程度上只到翻翻《自然史》杂志，或看看电视节目《新星》，就可以满足了。然而正是这稍许兴趣，在那个节骨眼上成了我的救星。因此，我鼓励年轻的历史学者，也应该有些与本专业毫无关联的爱好——语言学、建筑、爵士乐等。在你厌倦了同样的老问题时，它们或许能为你带来可以提出的新问题、好问题，这比好答案更难得呢。

于是我逃离意识形态式的历史诠释，转回头搜寻基本事实：生命、死亡。活就是活，死就是死，管他亚当·史密斯、卡尔·马克思、理查德·尼克松、勃列日涅夫说些什么名堂。到底是什么事物，令人的寿命活到可以生殖繁衍，又是什么东西，致令他们于死？或许，是食物与疾病？

提出这种大哉之间，就好像把你相机里的普通胶卷抽出，换成红外线

或紫外线底片。你开始看见以前从未看见的影像：大安的列斯岛屿的原住民现身了，然后又消失了。吃着玉米，而不是稻米的中国农民，隐隐在镜头中出现了。

大哉之问，当然，可能会引向过度简化之答。或许我自己就犯过这个毛病：谈到天花登陆美洲，以及第一次在此地传播感染的经过，我就表示：独独根据这项事实本身，欧洲人当然会在美洲大获全胜。的确，没有免疫准备的人口，一旦暴发疫病（通常称之为疫病处女地型的流行），常常会导致高死亡率。可是若无其他外力介入干扰，他们的人数久之自会慢慢恢复。

比方欧洲人口，即曾在 14 世纪因黑死病失去 1/3，却随着时间重新恢复。但如果黑死病袭击的同时，成吉思汗的蒙古牧族也涌到欧洲，故事就会很不一样了。事情的发展，说不定如同美洲，在天花及其他疫病蹂躏了先前从未见过它们的印第安人之后，欧洲人又接踵而至，如此这般的类似命运。

顺便提一句，如果黑死病和蒙古人当年真的联袂而来，我想，本人此刻也就不可能使用笔下正在用的这种印欧文字，来撰写这篇序文了。

又如果，哥伦布当年真能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成功直抵这一块大陆的极东端——就好像两端之间没有美洲存在——那么西班牙与欧洲，可能会因此更富，而奥斯曼帝国则可能变得更穷一些。权力、科技，甚至连同宗教，都可能发生重大移转变动。纵然如此，后哥伦布年月的种种发展，可能只会比事实上已然发生的情况更甚。不过总而言之，哥伦布当年毕竟到不了亚洲——中间有一南一北两块大陆，充斥着完全意想不到的生物、文化，挡在他的路上——而随着东西两半球开始交换生命形式，总体、个体，宏级、微层，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也从此彻底并永远地改变了。

初版前言

人类和其环境长远互动的史实

——美国人类学家 梅令 (Otto von Mering)

克罗斯比教授，属于一群优秀特异的社会历史学家。他将自己特殊的学术才能，投入一门新的领域，重新检视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人类行事与其周遭环境之间长远互动的记录。这门学问，我想可以称之为“人类医药学”史观史论，身为此学的倡导与阐述者，克罗斯比以洗练精粹的文笔，向我们介绍由生命与健康环境更替改变组成的多向链条。他的旧事新说，为人类锲而不舍、就是要去探索自己与自己栖息地的那股欲望毅力——虽然不总是明智之举，有时甚至做得太过——提供了一篇强有力的证言。

在此书中，读者将启程展开一场令人全神贯注的知识之旅，途中引人入胜，航行路过 1492 年以来所引发的文化、生物社会重大后果，包括事实与其诠释。读者将取得一个比较视角，审视种种范围遍及全世界的新旧大陆交换，以及社会、政治的后遗症：形形色色的疾病、梅毒，各式主要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天花、麻疹、肺炎。读者也将针对种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联动，获知了重要的历史答案，包括疾病与人类在洲际间的移动、世界粮食供应的累积性转型，以及有关世界人口增长变化某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对于新旧世界之间农作物品种、家禽牲畜的散布全球与相互交换，克罗斯比教授的刻画精确仔细，值得称道（前者如玉米、马铃薯、甘薯、豆类、树薯。后者如稻米、小麦、大麦、燕麦、水果；牛、猪、绵羊、山羊、

鸡、马)。我们也被他以下的主张说服：国家、区域、地方性农业经济上出现的渐次重组改造，其实与当地食物供应上发生的历史性衰减有所关联，也与世界粮食基本来源的质量、供应、产量息息相关。

在农作物品种、微生物机体的环球交换之下，人类、生态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作者于此议题所作的缜密推敲和考量，应能引起严肃关注当前人类状况的学者共鸣。他不疾不徐，描述了哥伦布大交换的历史，最后更以一篇发人深省的文字，重新检视 1492 年之后，时间上距今最近、长远观点上意义也可能最为重大的人为“后效”：亦即 1800 年后波澜壮阔的洲际移民潮现象。

世界性的人口移动，大规模地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却只对动物的迁移知之甚详，对它们这种行为的原因、意义、后果，比对人类的类似行为知道得多上许多。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如同现在一样，茫然于其中的前因后果，那么这些迁徙，在人与人之间未来路途上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我们也必将懵懂愚昧。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实在欠缺。当前暂时的矫正之法，就只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共同来寻思克罗斯比教授提出的观察：“地球上两个欧洲，一如也有两个非洲：各分居大西洋的两岸。”